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2年11月18日第B4版)

告别北京，告别苦难中的母亲

妈妈是我心中自强，自力，正直，侠义和敬业的典范，但是她在文革中却饱受磨难。一个曾经被国民党开除的左派学生在文革中被打成“漏网右派”。

文革初始妈妈就在轻院被批斗。她的左臂被折断造成粉碎性骨折，肿得碗口粗。她不但伤后五十天不获准去医院就医，还要抱着笤帚扫院子，从此她的左臂再也没有伸直过。即便这样，她始终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保持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清白。妈妈和学院领导们一起被批斗打骂，被泼墨汁，她就在提包里准备一身干净衣服，在路上的公厕里换好衣服回家，只字不提受到的虐待，怕给我们造成心灵创伤。她经常得意地提起周围好人对她的同情和帮助。其中有一个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每次去买饭，他都故意给妈妈的大搪瓷缸里多打些菜，然后马上盖上不让他人看见，无言地表达了对妈妈的同情，给了妈妈精神上极大的支撑和信心。

在饥荒年代，即便我们自家吃不饱饭，妈妈也经常接济院子里的贫困邻居，送他们衣物钱财。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我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对大家开放。每天晚上屋里排好凳子坐满了人；窗帘大开，院子里挤满了人；临街的后窗上都有人踩着梯子趴着观看。屋里屋外为中国乒乓球队欢呼的声音此起彼伏。父母善待邻居，也赢得了邻里的尊重和庇护。文革中轻院的造反派多次来抄家，父亲的藏书被抄走了大半卡车，但是邻居们始终对我们很好，没有出卖我们。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的皮鞭在胡同里挥打得震天响，我们院子里有几家被打抄，我家居然也幸运地躲过了。

对妈妈的理解和爱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我要离开家乡，离开妈妈了。那年我17岁，那年妈妈还在“牛棚”里。如果不响应号召，不到艰苦的地方去，妈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会被戴得更高。但愿我的“革命壮举”能让她感到自豪，让她更可以保持傲骨，昂首做人。

列车开动时妈妈的手势是鼓励我，要我坚强。但是多年以后提起往事，她说列车启动时，她的心一下子随着车轮的滚动而被掏空了。她想到的是昭君出塞，想到的是女儿一去难回。而我当时还是少年不知愁。

走进草原

从列车两侧飞快后退的是北京城市的房舍，迎面扑来的是广阔的农村。列车送我们到张家口，接下来是三天汽车行程到锡林浩特。

我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军用卡车，有的车装行李，有的车乘人。在光裸的车厢里我们或站或坐，有一种集体从军远征的感觉。抗战时期的十万青年十万军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青年学生的豪迈之举。我们从军远征的感觉只是大迁徙中的幻觉，似乎同样悲壮。一股革命激情催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在大动乱里中断教育以后，解决就业，把我们抛向农村边疆

的权宜之计，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场尝试，而我们只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沙石。中国人口大迁移的革命实践输出到柬埔寨，被红色高棉发挥到极端，结果惨绝人寰。

好在年轻，离家的痛很快就被青春的浪漫和对未来的向往替代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轻时的颠沛流离也是人生舞台上可歌可泣的一幕。

离开张家口一路向北，汽车沿着曲折回绕的盘山路缓慢上行，很快我们就领略到了坝上风光。七月的风变得舒展、凉爽、惬意，清新的空气里混杂着土地和青草的芬芳。高原辽阔平坦，一无遮挡，荒蛮中飘零着远古的余音、战马的嘶鸣。这是我们未曾踏上的祖国的土地。“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望着前面伸展到天边的路，龚自珍的诗句油然而浮上心头。

我们当晚住在太仆寺旗的旅店，依稀记得是男女分开的大房间，每个房间里是两溜大通铺。那里还有汉人生活，吃饭没有太多的不习惯。

第二天全天汽车都在戈壁中穿行。公路是在沙漠中铺土轧出来的一条蜿蜒的飘带，上面没有柏油，两侧黄沙常常漫过路边。放眼之处除了无际的沙漠就是随风滚动的带刺的骆驼草和稀疏的红柳。卡车开过，后面追随着荡起的黄烟。

我们的第二个夜晚是在大漠荒烟中的旅店度过的，让人想到古时边陲的驿站。我们灰头土脸地跳下卡车，在落日的余晖中疲惫地走进餐厅。一股浑浊刺鼻，令人窒息的味道扑面而来，过后才意识到那是牛羊血肉混杂的腥膻。这里已经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青菜短缺，肉食主要是牛羊肉。我在北京吃过东来顺的涮羊肉，但是从来没有闻过如此浓重怪异的味。简单喂饱肚子后马上逃离餐厅。

第三天只有大半天的汽车行程。我们穿过了荒凉苍寂的大戈壁，进入了绿草如茵的锡林格勒大草原。天高地阔，碧空如洗，锡林河在原野上迂回流淌，银光闪闪，白色的蒙古包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广袤的绿野之中。嗅着青草的芳香，望着成片的野花，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一扫旅途的寂寞疲惫，大家活跃起来，冲着成群的牛羊呐喊，迎着飘逸的马群欢呼，向着牧人们挥手致意。周围涌动的是青春的活力，是对牧区新生活的憧憬，是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的骄傲。

三天的长途颠簸到达了终点，汽车进入了锡盟首府锡林浩特。这里也是阿巴哈纳尔旗政府所在地。整个城市看起来像个灰蒙蒙的大村子，道路很多是碎石土路。我们下榻的阿巴哈纳尔旗招待所条件比路上的驿站好一些。餐厅里面弥漫的还是那种牛羊肉的血腥膻味儿，但是刺鼻程度减轻了不少。经过第一次的嗅觉冲击，现在可能有些习惯了。

在旗领导的欢迎会之后，我们一百多个北京学生分赴各自的公社。阿巴哈纳尔旗从南向北排着三个公社：胜利公社、巴彦宝拉格公社和阿尔善宝拉格公社。我们五十多个学生被分配到最北边的阿尔善宝拉

格公社。在锡林浩特市和中蒙边境之间。

据说蒙语“阿尔善”是“圣泉”的意思。“阿尔善宝拉格”即圣泉之乡。我们快要到达公社所在地阿尤拉海时在圣泉井停留。那是一口看来普通的水井，备有拴着井绳的帆布水斗用来汲水。亲自到锡林浩特迎接我们的公社社长是蒙族，精通汉语。他告诉我们圣泉水对治疗关节炎和头疼很有效，很多蒙古乡亲夏天会把蒙古包搬到附近汲水洗浴。向四周望去，发现可见之处的确有相对密集的蒙古包群。在社长的鼓励下，我用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灌满了井水。刚打上来的水清凉有气泡，喝起来有点奇特。但是过一段再喝，气泡散尽，就有很强的硫磺味道，只好丢弃。

阿尤拉海是由一片平房组成的小村落。房屋外墙大多由混杂干草打成的土坯垒制。房顶好像是在木椽子上覆盖了草泥浆。整个村子房地一色，没有树木，一片凋零。平时牧民孩子从四面八方的牧场到公社小学住校学习。当时放暑假，校舍空着，我们就落脚在公社学校。在食堂吃饭时我居然嗅不到腥膻气味，大概深入牧区，久入兰室而不知其芳香了。

初到巴彦塔拉

我们14个北京知青乘两辆马车奔向我们的终极目的地，至今仍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巴彦塔拉。阿尔善宝拉格公社从东到西有四个畜牧生产大队。巴彦塔拉在最西边，是四大队。

牧民把我们当成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首都北京—来的亲人，还没有进入巴彦塔拉地界，就看到奔驰而来的欢迎马队。马车被马队簇拥着，沿着草原上由车轮久压形成的车辙向西疾驶。远离故乡，远离亲人，前途叵测，命运未知。而此刻，充满疑虑的心在马蹄碎碎，车轮滚滚声中，在蒙古骑手矫健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容中逐渐舒展开来。

我们知识青年的新家是两个崭新的蒙古包。对异族风情的好奇让我们迫不及待地迈进蒙古包。我首先看到的是中间的铁皮火炉，周围除了进门一侧，三面都铺有地毡。前方一侧的地毡上还铺着漂亮的纯毛地毯。牧民家里的地毡直接铺在土地上，而在我们的蒙古包里，地毡下面精心地打制了木隔板。那是怕知青不习惯直接睡在冬冷夏潮的土地上。

我近距离地观察蒙古包的构造，墙是拉开的木网格，蒙语叫哈那。五个哈那墙连起来和门框拴在一起，就是我们蒙古包齐肩高的围墙。红漆门上嵌有一块小小的玻璃，用来透光。陶瑙是房顶中间的圆形木天窗，木料厚重，上面盖的毡子半开着，炉子的烟筒从天窗伸了出去。连接在陶瑙周边的伞形骨架叫乌尼。大木伞打开，每一根乌尼杆末梢搭在哈那顶上的一个木格交叉上，用牛皮条绑紧。蒙古包整个的木架结构外面用羊毛毡紧紧包裹，再用马鬃绳勒紧固定。夏遮烈日，冬避严寒，千年来蒙古游牧民族就是在这样简单的包舍中生长繁衍。

——待续——